

给储安平的四封电文及其文献价值

傅宏星

(湖南科技学院 国学研究所,湖南 永州 425100)

[摘要] 储安平在抗战期间曾任教于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前后时间长达4年半之久。对于他的这段经历,学界所知甚少,细节就更无从谈起了。根据新发现的四封廖世承院长给储安平的电文和1945年4、5月间储安平与校方往还的两封书信,可将储安平任教国师的时间圈定在1940年11月至1945年4月之间,而他出任桂林《力报》主笔则在1944年寒假。

[关键词] 储安平;国立师范学院;廖世承;电文

[中图分类号] K825.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12)03-0101-04

Four Telegraphs and Documentary Value to Chu Anping

FU Hongxing

(Academy of Chinese Learning,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Yongzhou, Hunan, 425100, China)

Abstract: Chu Anping has been worked as a teacher in Hunan Lantian national normal college during anti-Japanese war for four years successively. The academic circle knows little about his experience in this period, let alone the details. Based on newly-discovered four telegraphs and Chu Anping's two reply letters in May and April 1945 to the normal college, it gives a detailed account of dusty archives in order to unveil the history as a reference to researchers.

Key words: Chu Anping; national normal college; Liao Shicheng; telegraphs

储安平(1909~1966)是民国时期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政论家。他自1940年11月至1945年4月期间,任教于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当时该校在湖南安化县蓝田镇办学,而抗战后期则迁往湘西溆浦县,以下简称国师),其妻新文学作家端木露西女士则在国师附中担任英文教员。1943年春,夫妻俩在蓝田合办了一家集出版和销售为一体的书店,取名袖珍书店;是年寒假,储安平还曾只身前往广西出任桂林《力报》主笔。对于这段史实,学界所知甚少,难免语焉不详,即使在谢泳先生的专著《储安平与〈观察〉》中,也只有短短的一页内容,缺略太甚。^[1]王雨霖先生《储安平在国立师范学院》一文,虽然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材料,有理有据,考释精详,但令人遗憾的是,不少涉及储安平生平事迹的细节,由于文献证据不足,依然不清

不楚。笔者最近有幸在湖南省档案馆“国立师范学院档案”中,见到了4封当年国师廖世承院长发给储安平的电文(《本院催促聘请教员到职电文》档案号61-1-20),和2封储安平与院方往还的信函(《本院职员个人材料与任职延聘等函》档案号61-1-18),足以破解诸多疑问。故将新发现的材料录出,并略加考述,以供研究者参考之用。

一 储安平应聘国师的经过

第一封电文发于1940年9月26日,由湖南蓝田国师廖世承院长电重庆南温泉白鹤林2号储安平:“请兄任《政治概论》及《中国政府》课程,聘书航寄,务盼早临。”

第二封电文发于1940年10月9日,由廖世承院长电重庆南温泉白鹤林2号储安平:“兄任课

收稿日期:2012-04-20

作者简介:傅宏星(1970-),男,新疆石河子人,湖南科技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研究。

照旧。”

第三封电文发于1940年10月24日,由廖世承院长电重庆南温泉白鹤林2号储安平:“开课在即,请示行期。”

以上三封电文,主要涉及以下几方面内容:(1)聘书已于9月26日用航空信件寄出;(2)教授两门课程,分别为“政治概论”和“中国政府”;(3)关于授课内容,储安平与校方曾有过磋商;(4)截止10月24日,储安平一家尚未动身赴任,亦未告知校方具体行程计划。

通过相关资料可知,储安平应聘的职位应该是国师公民训育学系(简称公训系)教授。王雨霖先生指出:1940年10月21日出版的《国立师范学院旬刊》(简称《旬刊》)第23期“本学年各系新聘教员”名单里就有储安平。^[2]这说明在第一封电文发出前后,储安平就已经回电应聘了,所以《旬刊》才可能正式发布消息。至于储安平准确到校的时间,目前只能靠推测。1940年12月1日第27期《旬刊》记录了公训学会于11月18日举行仪式,欢迎新增教授陈定谟(1889~1961)、储安平、朱有骥(1911~1997)三先生。这则消息表明,储安平一家已于11月18日前到校,但哪天到的,仍没有明说。一般而言,从重庆到湖南,不管陆路还是水路,花去十天半月的路程都很正常。飞机虽然便捷,但在10月24日行程仍未确定的情况下,储安平拖家带口,不太可能在11月1日前赶到学校。所以,我还是倾向于储安平11月到校的判断。

关于储安平的课程安排,同样可以从第一封电文中得到印证。据1940年12月1日第二十七期《旬刊》载袁哲(1906~1974)《本院公民训育学系选修科目分组意见书》,公训系课程分4类:(1)普通基本科目:党义、国文、外国文、经济学、社会学、生物学、哲学概论、本国文化史、西洋文化史;(2)教育基本科目:教育心理、教育概论、中等教育、普通教学法;(3)分系专门科目:政治学、法学通论、伦理学、总理学说、中国政府、中国政治及伦理思想史、社会心理学、青年心理、心理卫生、公民教育、训育原理与实施、教育哲学、民权行使与实习、学校卫生与体育、升学及就业指导、毕业论文;(4)专业训练科目:公民科教材及教法研究、教学实习。储安平任教的是“政治学”和“中国政府”,各6学分。系主任是袁哲,1942年2月后则改由谢扶雅(1892~1991)担任。^[2]

此外,储安平与妻子端木露西已经有了3个孩子,此番来湘任教,极可能是举家搬迁。因为没过

多久,端木露西就在国师附中谋得了一个不错的职位,教授英语。端木露西在国师附中教职员题名册中出现过两次:第一次出现在英文教员名单中,任期是1941年2月至1945年8月;第二次出现在职员名单中,任期是1944年8月至1945年8月,岗位不详。可见她1941年2月到岗,1944年开始可能兼任了一点别的什么行政工作。

二 担任桂林《力报》主笔

关于储安平出任桂林《力报》主笔的经历,目前所能知道的材料同样不是很多,误解更甚。比如刘业伟《民主报人储安平研究》一文中如此介绍储安平:“1938年赴英国伦敦大学做研究工作,回国后先后担任《中央日报》撰述编辑、复旦大学教授、中央政治学校研究员。1940年在桂林《力报》任主笔,1945年在湖南《中国晨报》任主笔。”^[3]不仅时间上错误得离奇,而且似乎根本不知道储安平还有过在蓝田国师任教的经历。而报界前辈冯英子先生的回忆文章,恐怕是最早透露这一信息的资料吧,但片言只字,索解非易。他在《力报十年》一文中写道:“(桂林《力报》)张稚琴自己担任总经理,总编辑开头由欧阳敏讷担任,欧阳走后,由我接替;我走之后,又由欧阳来担任。主笔先后有刘虚、沈光曾、邵荃麟、杨承芳、宋云彬、储安平等。”^[4]

谈到桂林《力报》,不能不先说一下这家报纸的老板张稚琴先生。张稚琴是安徽无为,青年时就读于上海光华大学,后来在南京财政部作过科长,抗日初期任湖南保安司令部的主任秘书。在张治中的资助下,去广西桂林办了份《力报》。1943年初冬,当时的总编辑是冯英子,但他应范长江之邀,要前往江西吉安去作《前方日报》的总编辑。于是欧阳敏讷接任总编辑,可主笔宋云彬此时却因故离开了桂林《力报》。报纸不能没有主笔,于是,张稚琴就想到了自己大学时代的同窗储安平。储当时正好临近寒假,极有可能利用这段时间前往桂林,算是给张稚琴的报纸救急。

那储安平何时去的桂林呢?根据资料显示,1943年春,储安平与妻子端木露西女士曾开办了一家集出版和销售为一体的书店,名叫袖珍书店。他俩不仅编书、印书和卖书,还要组织名为“注册读者”的读书会,真是忙得不亦乐乎。而创办这个书店的重大举措之一,就是策划了一套“袖珍综合文库”。文库分两辑出版,每编5册图书,储安平任主编。目前所知,已出“袖珍综合文库”共计10种:第1辑推出5种,分别为陈之迈《最近五十年之中国

政治》(论文),钱基博《近百年湖南学风》(前集),吴稚晖《四十年前之小故事》,谢贻徵《纵横谈欧洲》,端木露西《海外小笺》(书信);第2辑推出5种,分别为:钱基博《近百年湖南学风》(后集),储安平《英人·法人·西班牙人》(论文),袁昌英《生死·友谊》(散文),高璧《斯巴达的男儿》(短篇小说),张文昌《旅美散记》(随笔)。没料到“袖珍综合文库”一经推出,销路极佳。比如端木露西的《海外小笺》(书信集)一书,1943年6月第1版刚刚发行,7月第2版就紧接着印刷了,可见这套丛书受欢迎的程度。尤其当第2辑5册于1943年10月出版时,作为主编的储安平,根本无法脱身。所以,我推测储安平只能在10月之后,即寒假开始后前往桂林。而准确的日期,恐怕只能留待异日查阅桂林《力报》求证了。

第四封电文发于1944年2月24日,由廖世承院长电桂林《力报》社转储安平:“丑皓(2月19日)上课,盼即来。”

由此可知,储安平在桂林《力报》工作到了国师新学期开学仍未返校,所以才有廖世承院长的这封催促电文。接到院长的电文后,储安平只好匆匆结束在桂林的工作。当他兴冲冲赶回学校时,长衡会战已经悄悄地拉开了序幕。

1944年4月25日《国力月刊》第4卷第4期转载了桂林《力报》上储安平的一篇文章,即《我对于苏联修宪案的看法》。编者复加按语曰:“本年二月一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委员长莫洛托夫,向苏维埃最高会议建议修改苏联宪法,使苏维埃十六联邦之每一邦均有与外国发生外交关系并缔结条约之权,各邦并有征募红军,建立本身独立之军队。此项新闻自莫斯科发布后,全球人士惊讶不已。对于此次苏联修改宪法之用意纷加推测。国立师范学院公训系教授储安平先生适在桂林,因为某报撰写《我对于苏联修宪案的看法》一文,连刊三日。查国内报纸对于此次苏联修改宪法,当无一报能详为论解有如储氏此文之精深独到者,而关于改组红军,俾予各邦建军权一节,中外评论,更少提及。储氏此文在桂发表后,大受各方注目,凡注意苏联问题以及研究宪法人士,无不将此文剪下,珍藏参考。本刊承储教授面允转载,无任荣感,望读者细心研究,幸勿漠然视之也。”^[5]既然是承作者“面允”而“转载”此文,也说明1944年4月储安平已经返回学校授课了。

随着日军日渐逼近湘中,蓝田告急,一时人心惶惶,政府机关、报社和学校则纷纷撤离或关停。

教师无法安心施教,学生无法安心读书,国师于是也计议西迁湘西溆浦。8月中旬,国师迁校诸事均按计划进行。我们虽然不知道储安平一家是何时动身的,但是随校搬迁,应是不争的事实。

对于此次国师西迁,储安平《英国采风录》自序有如下记载:“本书作于自长沙失守至桂林沦陷这几个月近乎逃难的生活之中。在这几个月中,他及他数以百计的同事,大都将整天的精力花费在每天的伙食琐事之上,心情因局势的动荡极不安定。然而在那种混乱、困顿、几乎无所依归的生活中,有时究不能不做一点较为正常的工作,以维持一个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生活的纪律。著者因于离乱之中,每日仍舒卷濡笔,稍事记述;当他所执教的学院西迁粗绪勉可复课时,他虽随作随辍,亦终写成了十章。”^[6]颠沛流离之中,吃饱肚子无疑是储安平面临的头等大事。他的心情虽因战局兵势的动荡而起伏不定,可仍不忘著述。其自序反映出他的书生本色,文字虽多描写个人感受,但与大的历史背景实无二致。

三 离开国师的前前后后

1946年2月,储安平的专著《英国采风录》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自序署“1945年4月10日于国立师范学院”。若从时间上分析,这篇序文恐怕是储安平在国师执教生涯中最后留下的文字了。储安平在国师任教期间发表的文章至少有8篇,而写作完成的著作则有6部,可谓成果丰硕。就笔者所知,著作分别是:《行政院与英国内阁之权责比较》(1943年,国立师范学院,湖南蓝田);《英人·法人·西班牙人》(1943年10月,袖珍书店,湖南蓝田);《自由、平等、权利与义务》(1943年10月,袖珍书店,湖南蓝田);《英国与印度》(1943年6月,科学书店,桂林);《英国采风录》(1946年2月,商务印书馆,重庆);《英人·法人·中国人》(1948年4月,上海观察社,上海)。大约就在储安平完成《英国采风录》序言前后,湘西会战已经开始,日军进军迅速,前锋已抵溆浦县境。风声鹤唳,国师师生遂于1945年4月中旬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紧急疏散。许多教师因此而离开了国师,再未涉足湖南这片抗战的热土。

1945年4月24日,储安平自辰溪给国师同事赵敏学和胡荣魁(字梅轩)去信,报告溆浦到辰溪沿途的交通状况和他个人的行止。当时,廖院长去重庆开会未归,离校期间请赵敏学代理院务,胡荣魁则任学院秘书主任。原函内容如下:

敏学、梅轩两兄大鉴:

弟于二十日下午乘美国汽车抵大江口,宿中心小学,校友陈炯华君在该校执教,故诸多便利,在大江口休息一天,二十二日乘船抵辰,大水时船行四小时即达,水小时一天必到。船费约五(六)万七(八)百不定,辰溪尚安靖,由辰溪赴沅陵轮船(七八万)、汽车(一千二万)均有,民船更多,大概每日均有,一切不若在淑所传种种之甚,弟在此休息数日,拟即赴沅小住,最近数日淑浦情形不知若何?院长不知已返淑未?均甚念念。弟之临时通讯处为:沅陵龙头井十八号李宅。余容续陈,端请

大安!

弟储安平启

四.廿四

从这封信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储安平脱离国师的准确日期,即1945年4月20日离开淑浦,4月22日到达辰溪,竟然与冯英子《回忆储安平先生》一文中储安平来《中国晨报》的日期惊人地吻合。因此,冯英子先生的回忆是真实可信的。

冯英子先生回忆说:“那时安平在蓝田师院教书,李(宗理)通过关系,把储重金礼聘来《中国晨报》作主笔。到我们在辰溪出版的时候,储果然应聘来了。他是宜兴人,储南强的侄子,皮肤白皙,长身玉立,一副秀里秀气的知识分子的腔调,尔雅之至。那时他已与端木露茜离了婚,身边带着一个三四岁大的孩子。《中国晨报》的编辑部设在铜湾溪,而营业部则在辰溪的街上,从铜湾溪去辰溪,隔着一条辰水,辰水上没有桥,靠小划子摆渡,上坡下坡,上船下船,安平都背着他的孩子,父亲而兼母亲,生活非常艰苦。有时我们觉得他很累,帮他背背孩子,他总含笑谢绝。我们发现他有一股坚忍之气,有时也觉得他有一种涯岸自高的知识分子的傲气。”^[7]

文中谈到“他已与端木露茜离了婚”,涉及广受争议的储安平与端木露西之间的“离婚悬案”,亦是储安平研究中无法回避的课题。可惜的是,离婚双方都没能留下有关共同生活及离异后的回忆录式的文本,后者虽长寿,但也终生保持缄默,因而为误解留下了巨大的想象空间。笔者认为俩人的离婚无法深究,也不必刨根问底。其实,生活中的有些事情,尤其是男女之间的感情纠葛,作为旁人,毕竟插不上嘴;况且,婚姻问题也只能是当事人双方自己能了解。

1945年5月1日,赵、胡二人复函沅陵龙头井

十八号李寓询交储安平,告知院况。复函原文如下:

安平吾兄道右:

手教奉悉,院方已于上月三十日复课,同时向辰溪、浦市疏散员生行李,并已在大江口设转运站,务希驾勿远离,俾易联系。茂公一星期内当可返院,并告。勿颂

旅绥

弟赵敏学、胡荣魁拜启

复信中赵、胡二人代表校方向储安平深致挽留之意,文简义深。或许,之前储安平已与廖世承院长有过约定,故而 he 应聘《中国晨报》主笔,前后盘桓3月有余,未尝不含有静观其变之意。只是后来国师发生“复员风波”,即国师在战后是移教首都南京还是留在湖南办学与教育部发生意见分歧,最终使储安平与国师因缘断绝,永无牵手之机了。估计正是在这个期间,端木露西携长子、次子和女儿前往重庆扶轮中学任教,而留下储安平带着幼子储望华在辰溪另起炉灶。大约在1945年9月左右,储安平也转道重庆,出任老友张稚琴创办的《客观》杂志主编,从此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为辉煌精彩的论政时期。

综上所述,把储安平任教国师的时间圈定在1940年11月至1945年4月之间,应该是确定无疑的。另外,他出任桂林《力报》主笔的起止时限,目前虽无直接证据予以说明,但基本上可以范围在1944年寒假,也是言之成理,较为谨慎的判断。所以,这4封电文和2封信件,对研究储安平生平以及当时的湖南战局无疑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参考文献:

- [1] 谢泳. 储安平与《观察》[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 [2] 王雨霖. 储安平在国立师范学院[J]. 书屋, 2006(12).
- [3] 刘业伟. 民主报人储安平[J]. 研究徐州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2).
- [4] 冯英子. 力报十年[J]. 新闻与传播研究, 1980(3).
- [5] 储安平. 我对于苏联修宪案的看法[J]. 国力月刊, 1944(4).
- [6] 储安平. 英国采风录: 序[M]. 重庆: 商务印书馆, 1946.
- [7] 冯英子. 回忆储安平先生[J]. 黄河, 1994(2).

责任编辑: 骆晓会